

湖北省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部
湖北省军区中原突围史专题编纂室
著

中原突围史



军事科学出版社

前 言

解放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为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而进行的一次伟大的人民革命战争。中国人民经过3年多的艰苦奋战，打败了美国当局支持的蒋介石反动集团，建立了人民的新中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实现了中国数千年历史上的一次伟大转折，给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的进程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如果说，解放战争为中国与世界近现代史谱写了一部壮丽辉煌的史诗，那么，中原突围则是这部史诗雄壮激昂的开篇。本书以大量真实可靠的材料，符合客观历史实际的鲜明观点，采用比较恰当的独特的布局和写法，完整系统地再现了中原突围这一伟大开端的前前后后。它记叙的是，由李先念任司令员、郑位三任政治委员、王树声和王震任副司令员（王震兼参谋长）、王首道任副政治委员（后任质斌接任）的八路军、新四军中原军区部队，遵照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的战略部署，英勇顽强地在作为全国六大作战区域之一的中原解放区进行战略坚持，牵制蒋介石“下山”抢夺抗战胜利果实的30余万国民党军队；又毅然分路举行中原突围战役，出奇制胜地杀出国民党军重围，一举粉碎蒋介石企图制造第二个“皖南事变”的“围歼”计划，出色地完成战略牵制和战略转移重任，并由此拉开全国解放战争的序幕；继而艰苦卓绝地在豫鄂陕、鄂西北敌后创建两块新的革命根据地，坚持与发展中原敌后游击战争，形成与全国解放区正面战场相呼应的广阔敌后战场，再次完成了“外线牵敌”重任；后又多方准备反攻中原，直至投入战略进攻，与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会合，恢复中原河山的全部战斗历程，以及由此所建树的卓著功勋。

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李先念主席、王震副主席于1992年6月21日、1993年3月12日相继逝世。为了表达对两位当年指挥中原军区部队的主要领导者的深切悼念和缅怀之情，我们特地将李主席生前所谈的《要正确评价中原突围》，王副主席生前所作的《李先念与中原突围》，收入本书作为两篇“代序”。读者从这两篇文稿中，可以更真切地看到中原突围前后的大体历史面目，以及这两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此段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从而更好地领悟全国解放战争伟大开端的真谛。

我们还将任质斌同志的《关于中原突围的几个问题》，列为本书的“代序之三”；并将他的被李先念主席生前肯定为“对五师的历史和经验作了很好的概括”的《新四军第五师是怎样成长壮大和完成她的历史任务的？》一文、也特意采取“附录”的形式收入了本书。这有助于读者更好地把握中原突围的来龙去脉。

正如李先念主席所说：“中原突围是中国革命战争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也是党中央、毛主席的重大战略部署。”“突围，是按照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指示行动的，是有准备有计划战略牵制和转移。”也正如王震副主席所说：“震惊中外的中原突围战役，则是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起点，埋葬蒋家王朝的光辉开端。它以迎击国民党军队发起全面进攻的首战壮举，为‘打败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开创了奠基伟业，在我党我军和我国革命战争的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当年，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在一系列有关的电报、文稿、谈话及报告中，早

就对中原突围等作出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中原突围所处的重要历史地位及其所起的特殊历史作用，决定了应该将这段历史列为一大重点研究课题，单独撰写成书。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中原突围同其他许多重大革命历史事件的研究总结工作一样，被提上议事日程。中共湖北省委对编修中原突围史的工作很重视。1979年7月30日，湖北省委常委讨论同意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关于成立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室的报告。这个报告确定编辑室从回忆录入手，广泛征集包括中原突围在内的有关历史资料。1983年5月6日，湖北省委正式下达了必须写好包括《中原突围史》在内的三部史书等任务。为此，成立了鄂豫边区革命史编审委员会，请李先念、王震、王首道、任质斌同志作名誉主任。编审委员会由审议委员会、编辑委员会组成，编委会下设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部。1985年7月8日，湖北省委进一步强调包括《中原突围史》在内的“收集和整理出版工作，是一项慰先烈、昭后人的光荣而重要的工作，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并确定编辑部机关党的组织关系由省直机关党委领导、编辑部机关工作归省委办公厅管理等。1986年3月5日，湖北省委同意关于编写《中原突围史》等方面的意见，确定依托湖北省军区组织征编各路突围的专题资料，并请有关老领导、老同志分任各路专题撰写工作的指导人。为此，湖北省军区于1986年8月组建起中原突围史专题编纂室，负责完成省委下达的各路专题立资任务。这样，使我们的撰写工作既有得力的上级领导，又有相应的组织机构保障。

首先，立准立好史料，求实求真，进而从客观的历史事实出发，把《中原突围史》撰写成一部具有真实性和可读性的史书，是我们努力的目标。由于中原突围是中国革命历史上一次极为艰苦的战略转移，在当时特定的条件下，许多珍贵的历史资料未能保存下来，这给我们的编史工作带来了很多困难。因此，立准立好这段历史资料的任务是很繁重的。在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室时，就已开始征集有关资料，并编辑了《中原突围》丛书第一、第二辑，分别于1983年、1984年出版。中共湖北省委正式下达编写《中原突围史》的任务后，编辑部又抓了这方面史料的征集汇编工作。特别是1984年8月6日李先念主席作出“请帮助他们解决找资料问题”的指示，编辑部派人到中央档案馆和中央军委档案馆，征集到一批珍贵史料。1985年3月，编辑部整理出“中原突围前后大事记”、“中原军区部队战斗序列”等，印发征求意见。1986年纪念中原突围40周年之际，编辑部又编辑出版了《中原突围》丛书第三辑。湖北省军区中原突围史专题编纂室组建后，根据中原军区部队分路突围的特点，组织开展了各路专题立资工作。在各路专题指导人和有关老领导、老同志的指导与帮助下，编纂室经与编辑部、陕西省商洛地委党史办、南京军区一八一师军史办等单位通力协作，在“广征、核准、精编”上反复下功夫，先后形成了“中原军区部队北路突围与豫鄂陕革命根据地”、“中原军区部队南路突围与鄂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原军区第一纵队第一旅掩护主力突围与东进苏皖解放区”、“中原军区鄂东独立第二旅突围与坚持大别山游击战争”等4个专题的文章、大事记和组织序列。其间，编辑部、编纂室于1988年1月正式成立中原突围史课题组，分工协作，共同承担撰写《中原突围史》的有关任务。课题组首先编写出了简要的《中原突围纪事》，在1988年至1989年的《地方革命史研究》杂志上连续刊载征求意见。后又按照任质斌等老领导、老同志关于修改补充《纪事》、单独成书出版的提议

和要求，于1990年至1991年，对《中原突围纪事》书稿作了5个回合的编修，并有重点地沿中原突围路线进行了实地考察。该书已于1992年10月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与此同时，我们还先后编辑出版了《西征》、《旌指武当》、《鏖战大别》等专辑。这些都为《中原突围史》的编写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认真研究中原突围前后的历史，充分反映在深入研究中所获得的一切新成果，亦是我们着力使《中原突围史》能够正确地揭示历史的真实及其经验、具有自身特色的一个重要方面。广泛征集和立准立好这段历史资料的过程，同时也是我们研究工作不断发展和深化的过程。早在1981年，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和中原突围35周年，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室经过初步征研史料，并到北京向有关老领导、老同志求教，撰写了《胜利的中原突围》一文，从解放战争全局来考察论证中原战略坚持和战略转移，得出了中原突围是伟大胜利的突围这一鲜明的科学结论。这篇论文，首载于1981年6月28日的《人民日报》，后在中共党史学会1991年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所举办的全国首届党史优秀论文评奖活动中，荣获一等奖。在此期间，李先念主席于1982年，1983年作了《关于编写新四军五师战史和鄂豫边区革命史的谈话》，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的《李先念文选》亦于1989年1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中均有关于中原突围前后的论述，这些都为我们研究和编写这段历史提供了极重要的指导与依据。1991年，编辑部根据李先念主席《谈话》、《文选》中的精神和有关老领导的指示，又撰写了《胜利来自非凡的革命胆略——纪念中原突围45周年》一文，着重阐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以非凡的无产阶级革命胆识与胆略，接受挑战，力挽狂澜的大无畏精神，作出中原突围与迎击国民党全面进攻的一系列英明决策和战略部署，为全国解放战争开辟了胜利道路。此文于7月14日被《人民日报》刊载。这表明，对中原突围的研究工作有了新发展。在此前后，编辑部、编纂室及中原突围史课题组发扬知难而进的精神，对一些重大学术观点不执偏见，坚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攻克重点。解决难题，开展了多方位、多角度的深入研究。例如，我们既从解放战争全局的高度来充分肯定中原突围的战略作用，同时又从战役的角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经分析认为，1946年6月26日晚，以中原局和中原军区首脑机关主动撤离驻地宣化店为标志，是中原突围战役的开始；到7月31日，中原军区各路突围部队先后实现了战略转移，并肩负起在敌后创建根据地等重任，标志着中原突围战役胜利结束。参加突围作战的5万英雄儿女，杀出了国民党30余万大军的重围，在历时36天的战役中牵制国民党兵力达32个旅，并给其以重大杀伤，自己的军力仍保存了4万余人。通过对中原突围战役时限问题的科学界定及对战役本身的具体分析，我们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即中原突围战役不仅从战略上取得了牵制大量国民党军的胜利，而且其战役本身亦取得了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胜利，从而揭示了中原突围战役作为解放战争之首战，夺得了全面胜利。我们在研究豫鄂陕和鄂西北这两块敌后新根据地的创建时，对李先念司令员率领中原局、中原军区领导机关和中原军区主力一部亲手创建豫鄂陕根据地的全过程作了重点剖析，以大量事实论证了李先念是这一革命根据地的主要缔造者；对中原军区主力另一部在鄂西北敌后创建根据地，也从战略转移路线的改变、战略牵制任务的急需、战略探索行动的取舍、战略地理位置的重要等方面进行分析，并在兴利除弊、是非评说上作了探讨，

从而论证了选择在鄂西北敌后创建革命根据地是一个伟大的历史选择。我们还就中原坚持与突围之战略方针的演变，自卫反击的桐柏战役，中原停战谈判斗争，中原突围战役对战略转移理论与实践的丰富和发展，解放战争初期在敌后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新经验，中原地区国共双方军事力量的态势及兵力变化，从中原突围到千里跃进大别山等重要问题，分别作了研究和探讨。其他诸如中原军区第一纵队与江汉军区的关系，一纵一旅东进苏皖解放区，第二纵队中的三五九旅返回延安，西进路上的干部旅，鄂东独立第二旅坚持大别山游击战争，豫鄂陕军区主力北渡黄河，鄂西北军区主力转入外线作战等有关难点问题，都通过深入细致的研究得到了比较科学的解决和表述。《中原突围纪事》、《西征》、《族指武当入《鏖战大别》等书稿的编成，亦是大量研究工作的成果。在本书中，我们博采了这些已有的研究成果。

为了完整系统、真实准确、生动形象地再现中原突围前后的历史面貌，我们在撰写这部史书时力求科学地运用准确可靠的史料，精心构思，合理布局，采用比较恰当的体例和写作方法，努力做到“四个结合”。即将写中原军区部队突围前后的战斗历程与解放战争全局的大形势相结合；将写分路突围后各路部队的战斗历程与中原突围前后的整体过程相结合，同时，既史论结合，又文史结合。

我们曾在《中原突围纪事》一书中，把中原突围前后划分为5个阶段：一是中原战略坚持与突围准备（1945年8月10日—1946年6月25日）；二是中原突围战役（1946年6月26日—7月31日）；三是创造新根据地与坚持中原敌后游击战争（1946年8月—1947年1月）；四是主力北渡黄河与转入外线作战（1947年2月—7月）；五是投入战略进攻与恢复中原河山（1947年8月—12月）。这5个总体阶段，也贯穿在《中原突围史》中；但本书与《纪事》的体例、结构又不相同。《中原突围史》的正文部分，由中原突围的历史背景；中原突围的战略部署；中原军区北路军、河南军区部队突围，豫鄂陕根据地的创建与主力北渡黄河；中原军区南路军、江汉军区部队突围，鄂西北根据地的创建与主力转入外线作战；第一纵队第一旅掩护主力突围，东进苏皖解放区；鄂东独立第二旅掩护主力突围，坚持大别山游击战争；中原突围的历史功绩及其经验等7章组成。很明显，《纪事》中所划分的第一阶段，在本书中则分成第一、第二两章；本书中的第三至第六等4章，虽然突出了各路部队自身的连贯性，但也贯穿着《纪事》中所划分的第二至第四这3个阶段的总体阶段性；本书的第七章中，亦包含着《纪事》里所划分的第五阶段，并以“中原部队保存下来的基本骨干力量投入战略进攻，恢复中原河山”为题专写了一节。本书的这一布局与结构，是经过1985年4月、1986年4月、1987年4月和7月、1989年5月、1991年5月先后5易其纲目，并广泛征求意见，从撰写本书的有关实际情况出发的产物，有利于做到上述“四个结合”，具有独特的风格。

我们还在本书中编入了7个附件，即：中原突围前后大事记；中原军区战斗序列和中共中央中原局、中原解放区民主政权组织序列表；参与围攻中原军区之国民党军序列表；中原突围部队及有关根据地营以上烈士名录；中原突围部队及有关根据地县团以上干部名册；中原军区部队在中原突围前后各时期主要战役战斗战果统计表，以及中原军区部队在中原突围战役中主要战斗战果一览表；13幅附图。此外，还收入了20幅照片。这些附件，是我们作为本书的“基础工程”而逐一完成的，它们与正文相配套，使本书

显得更为完整。

1996 年 6 月 26 日，是胜利举行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一个战役——中原突围 50 周年纪念日，值此光辉的历史时刻，本书的问世更富有特殊意义。希望它能够成为广大读者学习革命历史和革命传统的好教材，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和实现跨世纪的宏伟纲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启示录，进一步深入研究解放战争之伟大开端的“必备书”。这是我们撰著与出版本书的心愿。

作者

1995 年 12 月

关于中原突围的几个问题 (代序之三)

任质斌

我想了一下，说五个问题：（一）中原突围是正确的；（二）向西突围不能说是错误的；（三）坚持豫鄂陕斗争的意义和作用是很大的；（四）北渡黄河是正确的；（五）晋城高干会议是没有起积极作用的。我说的虽然是些空泛的议论，但不是没有针对性的。

（一）中原突围是正确的

1946年6月底，我中原部队分路突破了国民党30余万军队的重重包围，实现了战略转移。应该肯定，这个突围是正确的。

自1945年8月日寇投降起，到1946年6月中原部队突围，五师及中原部队英勇顽强地进行了10个月的战略坚持，拖住了国民党“下山”抢夺抗战胜利果实的30余万大军，的确起了把守中原大门、大量牵制蒋军的战略作用，为华北、华东的兄弟部队准备迎击国民党挑起的内战赢得了时间，创造了有利条件。

抗战胜利后，王震、王首道同志率领的八路军第三五九旅南下支队自粤北返，王树声、戴季英同志率领的河南（嵩岳）军区部队从豫西南下，同新四军第五师于1945年10月下旬在桐柏地区会师，组成了6万余人的中原人民解放军。并以位老（即郑位三）和先念同志为首，成立了中原局和中原军区。

1945年10月10日国共两党签订《双十协定》之后，我党按照协定，将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的部队都陆续地撤到了华北和苏皖边区。只有中原部队尚未撤离。

三大主力会师后，进行了湖阳、双沟、祁仪等较大战斗。由于这几次作战没有达到全歼犯我之敌的预期目的，国民党军队气焰嚣张，步步向我紧逼，使我根据地逐渐缩小，财政日益困难。为了摆脱这种困境，中央曾同意中原部队主力实行战略转移，以大部主力去皖东。中原军区当时确定，王树声部3个旅、三五九旅转移到皖东去，与新四军二师会合；同时由王震、周志坚同志和我带第十三旅护送，能回则回，不能回也留在皖东。五师的其余部队由先念同志和位老、陈大姐（即陈少敏）率领留在中原地区坚持。我们到了平汉路东，刚打下了光山，党中央发来了1946年1月10日的停战令，说国共两党签订了就地停战的协定。于是，先念、位老发电报给我们，要我们到宣化店开中原局会议。在会上，大家都异口同声地说不走了。其所以如此，一方面是执行中央的命令，一方面是舍不得离开老根据地。后来有人说：当时如果不管就地停战的命令，继续进军到皖东，那就可以保存四五个旅，到第三次国内战争爆发以后，对全局的贡献可能更大一些。我看，不应该这样提问题。对于党中央发出的事关全局的命令，怎么可以拒不执行呢？

停战期间，国民党对我在战略地位上比较突出的中原部队，逐步包围压缩，实行经济封锁、政治破坏。鉴于这种情况，中央又曾在1946年二三月间

这是中原突围时任中原局委员、中原军区副政治委员兼第二纵队政治委员，创立豫鄂陕根据地时协助李先念司令员主持工作的任质斌同志，1984年6月24日在北京“豫鄂陕边区党史座谈会”上的讲话。

指示中原军区力争合法北移。为此，中原局和中原军区曾经进行过争取部队合法转移的斗争。当时根据《双十协定》的有关条文，数度向国民党交涉中原部队转移至苏皖解放区。王震同志去和国民党谈判，主要就是谈和平转移问题。但国民党认为我们已经是他就要吃到口里的东西，我们要和平转移，他不干。他们继续调兵遣将，以 30 万之众重重包围，妄图发动“皖南事变”那样歼灭我中原军区部队，然后再向我华中、华北、西北等解放区展开全面进攻。

在这千钧一发的形势下，我党我军对于国民党强加在我们头上的全面内战，是束手就擒、坐以待毙，还是挺起胸膛接受敌人的挑战？党中央和毛主席从当时严峻的实际情况出发，以无比的勇气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后一条路，指示中原部队坚决突破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向其他解放区转移。党中央和毛主席当时的战略决策，很像解放后的抗美援朝，充分显示了非凡的革命胆略。

根据中央指示正式作出突围的具体部署，是在 1946 年 6 月 20、21 日。当时确定大小分七路突围，主力是两路。接到党中央和毛主席 6 月 23 日关于“同意立即突围，愈快愈好，不要有任何顾虑，生存第一，胜利第一”的复电后，我们行动很快。蒋介石的部署是，7 月 1 日向我中原部队发动总攻；我中原部队于 6 月 26 晚分路举行突围，比他早了几天。

这时进行突围转移，完全应该。不然，就会成为新的“皖南事变”。人家 30 余万大军，我们只有 5 万人（原有 6 万部队已复员了 1 万），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太大了；加之我们处在他的心脏要害地区，他是势在必争的。即使我中原部队能在根据地周围打几个大胜仗，也无法保住原有的根据地不丢。这从 1946 年秋华中部队在苏皖地区虽曾“七战七捷”，但仍不得不转移到山东的战例中，即可得到旁证。

中原突围虽然有损失，但中原部队的基于力量保存下来了，而且打乱了敌人的作战部署，杀伤了大量敌人，继续牵制了国民党军的大量兵力，使之不能在其预定时间里集中兵力转向对华中、华北、西北等解放区进攻。

这些都说明，中原突围是正确的。它是我党我军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是党中央、毛主席在重大历史转折关头的重大战略决策，是中原部队粉碎国民党企图消灭我中原军区主力、制造新的“皖南事变”阴谋的重大胜利。正是以这一壮举为起点，展开了伟大的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

（二）向西突围不能说是错误的

在部署中原突围时，我军选定了“主力向西”的战略转移方向。主力向西突围究竟对不对？有人议论说，当时向东突围的皮定均旅，掉队落伍的不多，力量没有大的损失，你主力部队若是不向西而向东突围，是不是也会好些？

关于突围转移的方向，当时的计划是主力经鄂西北、陕南，走陇东到陕甘宁边区。在正式确定这个突围转移计划时，中原局的委员们是一致同意的。

为什么主力不向东突围转移呢？一是因为：王震同志在同国民党谈判我军合法转移时，就是讲的要转移到皖东地区，所以国民党对我向东转移防范较严，他们的兵力部署的重点就是防我向东转移。二是因为：淮河与长江中间有个巢湖，如果主力向东，要么从长江与巢湖之间的狭窄地带通过，要么从淮河与巢湖之间的狭窄地带通过。当时广西军的战斗力较强，如果把两条狭窄地带封锁起来，我们的大部队就进退两难了。这个问题，当时曾经摆开地图研究过。

皮定均那个旅很顺利地到达皖东，很难说明若主力向东突围，也一定会很顺利。皮旅只几千人，在出敌不意的情况下，几个钟头即可通过上述狭窄地带；而中原部队的主力却是三四万人，行动就不那样灵便了。二者不可类比。因此，没有根据说主力向西突围是错误的。

当然，向西突围的具体部署并不是完全没有缺点的。从领导思想讲，当时我们把突围到陕甘宁边区看得简单了一些，对于进行外线作战——特别是对于到鄂西北、豫鄂陕崇山峻岭中作战的困难估计不足。

中原局的委员，多数是经过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当时以为突围到陕甘宁边区不过两三千里的行程，来个 20 几天的急行军就到了。这有点经验主义。事实上，1946 年中原突围时的情况，同过去红军长征时的情况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些变化是：

第一，国民党的军令、政令相对统一了。红军长征时，还有一定程度的军阀割据。红军进入四川，云南、贵州的军阀部队就进不了四川；红军到了陕西，杨虎城的军队又不准四川部队进陕西。红军可以利用这个矛盾。而中原突围时，国民党的中央军、杂牌军虽然仍有一定的矛盾，但都脱离了自己的地盘，可以全国调动。

第二，国民党军队的装备、火力加强了。红军长征时，国民党军和红军都是两条腿走路，但国民党军队跑不过红军。而到中原突围时，国民党可以用汽车、公路运兵了。我们到浙川时，发现原被甩在屁股后面的敌人，却已利用公路汽车赶到我们前边了。这时国民党军队的装备大大加强了，一个班就有一挺轻机枪，能组织起严密的交叉火力。

第三，国民党的地方保甲组织建立起来了。保公所里装有电话，我们的部队刚一出动，他的电话就打到前边去了，马上就搞坚壁清野。

这三点，我们在中原突围前都认识得不深。此外，当时也没有深刻地认识到鄂西北、陕南是崇山峻岭、穷山恶水，很不利于大部队行动。后来，部队过汉水、丹江后，在鄂西北和秦岭山间里走，不仅人烟稀少，粮食、宿营都很困难，而且山高、路险、沟深，在一条沟里走几十里路，转过来、转过去必须过几十趟河。夏天过河，水也刺骨的凉。所以走几天，鞋子就磨烂了。以后打赤脚走，脚又磨破了。马掌也磨掉了，马也走不动了。那个境遇是很苦的。

如果我们在突围以前，对进行外线作战的困难估计得足一些，准备得好一些，损失当然会减少一些。但在国民党军队的主力没摧毁之前，大兵团伸到敌人腹地作战，再强的指挥员也不可能使部队不受损失。1947 年刘邓大军在晋冀鲁豫地区打了许多大胜仗以后，挺进到大别山，不是也遇到了许多困难么？那还是胜利的反攻呀！当时我们是突出重围、向西作战略转移的部队，不受一定损失是不可能的。

所以，对主力向西突围中的损失应当作具体分析。有些损失是可以减少的，有些损失是不可避免的。由于突围前对进行外线作战的困难估计不足，因而使可以减少的损失未能减少，这当然是失误，但不能以此作为否定突围方向的根据，不能说明主力向西突围是错了。

（三）坚持豫鄂陕斗争的意义和作用是很大的

我突围到陕南的部队，自 1946 年 8 月初在豫鄂陕边区建立几个军分区起，到北渡黄河止，又在豫鄂陕地区坚持斗争了半年多时间。这是遵照党中央发出的新的指示——在敌后就地创立根据地、继续在外线牵制反动派的指

示进行的。在半年多的坚持中，豫鄂陕军区部队又牵制了国民党军队的好几个旅，特别是推迟了胡宗南进攻延安的时间，为其他解放区内线作战的兄弟部队夺取胜利起了很大的配合作用，意义是很大的。

这半年多的坚持是极为艰苦的，我军又一次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当时党中央确定中原局的几个领导同志回延安，派汪锋同志到豫鄂陕边区主持工作。汪锋同志是受命于危难之时，他和豫鄂陕边区党委、军区、行署的几位同志，积极领导了这场艰苦斗争。

在这场艰苦斗争中，陕南的地下党和游击队是很坚强的。如果没有陕南地下党和巩德芳等同志领导的陕南游击队的支持和帮助，那我军就更困难了。现在写这段历史，应该大书特书当年的陕南地下党和游击队。

与突围到陕南的部队一样，突围到鄂西北的部队和留在鄂东、鄂中坚持的部队，也都进行了具有战略意义的斗争，取得了很大成绩，发挥了很大作用。有些部队在极端困难的环境里，一直坚持到刘邓大军南下，用血和汗写成了光辉灿烂的历史。张体学部最后几乎打光了，打光了也是胜利的。担负牵制任务的部队，不可避免地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嘛！

（四）北渡黄河是正确的

1947年二三月间，豫鄂陕军区部队分批北渡黄河，到山西晋城休整。

北渡黄河是正确的，把原新四军第五师的基本力量保存下来了，并且保存了很大一批干部。从突围进陕南到北渡黄河，我军在豫鄂陕边区顽强坚持了半年多时间。如果还继续坚持下去，再拖上半年，那损失恐怕更大了。

有人说，中央不是要你们在陕南坚持下去吗，怎么北渡黄河了？据我所知，当时不完全是这个情况。中原局的几位领导同志到延安后，过了一段时间，曾经决定我仍回陕南去，协助豫鄂陕军区的领导同志工作。临行前，我到刘少奇同志那里请示，刘少奇同志确曾讲过：一定要在陕南坚持，不惜牺牲，牵制住胡宗南的部队，就是打光了也是有意义的。但第二天上午，我又到毛主席那里，毛主席一面吃饭一面对我说：看情况办事，部队能在那里坚持就坚持，不能坚持就过黄河。后来的实践证明，中央是同意和批准了豫鄂陕军区部队过黄河的（汪锋同志插话：我1959年到北京，在怀仁堂小房子里，周总理对我说：你们不过黄河也不行。主席讲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北渡黄河，正是为了保存“青山”。当时的实际情况是你再坚持下去，也拖不住胡宗南的部队使他不进攻延安。虽然可以分散他的一部分力量，但起不了根本改变局面的作用。

北渡黄河，就是从陕南撤退。1947年3月当国民党向我党中央所在地延安和陕甘宁边区进攻时，党中央不是也断然决定于3月19日主动撤出延安吗？这种撤退正是为了选择有利时机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

从陕南撤退，到晋城休整一下，让部队恢复恢复疲劳，然后再参加战略反攻，是对的。这已被后来挥师南下、重返中原的事实所证明。

（五）晋城高干会议是没有起积极作用的

1947年六七月间，原中原局在山西晋城召开了高于会议。这时，作为领导来讲，应该充分肯定中原突围的成就和意义，针对部队过了黄河后的一些失败情绪，大张旗鼓地宣传突围取得的重大胜利，给大家打打气，多讲前途光明。红军长征到陕北时，毛主席就曾高度评价长征的伟大胜利和意义，说二万五千里长征是历史记录的第一次，起了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的作用。这对鼓舞士气起了很大的作用。

但是，当时中原局的部分领导同志对中原突围的意义估计不足，只看到丧失了根据地和部队大量减员的一面，没有认识到它牵制了大量敌人和保存了基干力量的战略作用。甚至有人曾经认为这次中原突围和“皖南事变”差不多。因而在这次高干会上突出地强调了要总结经验教训，并企图借此时机来克服某些同志的所谓“单纯军事观点”。这就助长了部分同志中本已存在的某些互相埋怨、互相指责的失败情绪。影响所及，后来有的同志竟认为中原局在领导中原地区工作时所执行的政治路线也是有错误的。会议只好无结果而散。这次会议开了60天，没有起到鼓舞士气、增强团结的积极作用，反而起了一些削弱团结、涣散人心的消极作用。同时，由于有些对中原突围的不恰当的论断是出自中原局的个别负责同志之口，致使外界不明真相的人也误以为真，这在一定程度上起了以讹传讹、混淆视听的作用。当时我是中原局的一个委员，在这次会议中没有起到应有的积极作用，也是有责任的。后来豫鄂陕军区部队改编为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二纵队重返中原时，幸亏陈毅同志1947年11月根据毛主席、刘少奇同志的指示，在淮阳地区讲了话，从战略全局上充分肯定了中原突围的重大胜利和五师部队的重大贡献，才把大家的劲重新鼓起来了。现在编写中原突围史，应该从正面的叙述中，来消除那些消极的影响。以上我讲的5个问题，对写豫鄂陕边区的历史，对写整个中原突围的历史，不知道是不是有点帮助？我认为只要把这几个观点树立起来，其他枝枝节节的问题就不必扯谁是谁非了。

李先念与中原突围 (代序之二)

王震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所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以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即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豪迈地宣告结束的。震撼世界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消灭了蒋介石的 800 万军队，推翻了国民党反动政府，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从而最后结束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巍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并逐步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而震惊中外的中原突围战役，则是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起点，埋葬蒋家王朝的光辉开端。它以迎击国民党军队发起全面进攻的首战壮举，为“打败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开创了奠基伟业，在我党我军和我国革命战争的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正如先念同志在《要正确评价中原突围》的谈话中所说：“中原突围是中国革命战争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也是党中央、毛主席的重大战略部署。如果有人认为中原突围就意味着失败，那是因为不了解历史情况。”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蓄谋发动新的内战，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中原解放区则首当其冲。为了加强中原地区的武装斗争力量，遵照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指示，我率八路军第三五九旅南下支队自粤北返，王树声等同志率河南（嵩岳）军区部队，和冀鲁豫军区第八团南下，与先念同志率领的新四军第五师部队在桐柏地区胜利会师，并组建了中共中央中原局和中原军区。中原军区成立前后，我军坚决地进行了反对内战与争取和平的斗争；继而又展开了反对国民党破坏停战协定与争取主力合法转移的斗争。当时的局势愈来愈严峻，国民党反动派先后调集了 30 余万军队进攻包围中原军区部队，并实行经济封锁，中原地区内战有一触即发之势。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曾受中共中央中原局和中原军区委派，于 1946 年 3 月到延安请示行动方针，聆听了毛泽东主席的指示。他要我记住告诉先念同志：蒋介石和国民党反动派对待我们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的原则是，“能消灭的则坚决消灭之，现在不能消灭的则准备条件将来消灭之”，我们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毛主席要求中原军区部队，继续完成牵制国民党军队的战略任务，并要准备作出重大的牺牲，即使是全军覆没，也要保障战略全局的胜利。我于 4 月 9 日返回湖北宣化店后，即向先念同志等作了传达。毛主席的这些重要指示，使我们当时在错综复杂的斗争中，保持了清醒头脑，坚定不移地率部继续进行顽强的战略坚持，同时加紧了对付突然袭击与实施武装突围的战略准备。后来突围，都是按照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行动的，是有准备有计划战略牵制和转移。以毛泽东主席为核心的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深刻地指出了中原内战的爆发必将成为全面内战的起点；为迎击国民党军队对我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制定了全军南北两线的作战计划，并在拟出和调整南线作战方案与战略方针的前后，对中原军区主力主动作战略转移的方向、时机、终点等也分别作了最后选定，还对主力突围与原地坚持部队的战略牵制任务、分路突围的战略战术等均作了明确指示。正是在毛主席和党中央、中央军委的英明、正确的领导下，我中原军区部队面对蒋介石于 1946 年 6 月 26 日发起的大举“围歼”，当日晚即开始分路举行中原突围战役，一举杀出了国民党 30 余万

大军的重围，出色地完成了战略转移与战略牵制重任，胜利地拉开了人民解放战争的序幕。

毛泽东主席早在 1946 年 7 月 15 日就曾以中央军委名义发电报 指出“ 整个突围战役是胜利的 ”，“ 给反动派以极大震动与困难 ”，“ 关系全局甚大 ”。10 月 1 日，他又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的指示《三个月总结》中再次指出：“ 过去三个月内，我中原解放军以无比毅力克服艰难困苦，除一部已转入老解放区外，主力在陕南、鄂西两区，创造了两个游击根据地。此外，在鄂东和鄂中均有部队坚持游击战争。这些都极大地援助了和正在继续援助着老解放区的作战，并将对今后长期战争起更大的作用。 ”这是对中原突围战役，以及随后迅速创建豫鄂陕、鄂西北两个敌后新根据地，广泛开展中原敌后游击战争，所作出的高度评价和正确的历史总结。中原突围战役的胜利，和中原敌后战场的形成与发展，既有力地配合了解放区正面战场，支援了兄弟部队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又在解放战争的初期，创造和积累了实行战略转移、坚持与发展敌后游击战争的新鲜经验，丰富了毛泽东军事思想；还为我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尤其是战略反攻中原，准备了有利条件。再后来，由原新四军第五师主力（即豫鄂陕军区主力）改编的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二纵队，挥师重返中原；还有在中原敌后坚持、发展游击战争的各支部队和游击队，都一并与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刘伯承、邓小平同志所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会合，投入了恢复和发展中原解放区的伟大斗争。

毛泽东主席在《三个月总结》中所说的中原解放军“ 一部已转入老解放区 ”，即指中原军区第一纵队第一旅东进苏皖解放区，和第二纵队三五九旅等胜利返回延安，这亦是中原突围取得全面胜利的重要组成部分。我率三五九旅返回延安后，受到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各界的热烈欢迎。不久，三五九旅扩编为一个军，参加了保卫延安、保卫陕甘宁边区的重大斗争。后来，这支部队打到陇东、关中，消灭了胡宗南不少的军队，直至进军新疆，解放新疆，以后改编为生产建设兵团。突进苏皖解放区的第一纵队第一旅，补充整编为华中野战军第十三旅，后又改编为华东独立师，统一全军部队番号时又改为第一八一师，先后参加了苏中、莱芜、孟良崮、临汾、太原等著名战役。如果没有胜利的中原突围，也就没有这两支部队后来所取得的一系列胜利。

先念同志在关于《要正确评价中原突围》的谈话中曾经说过：“ 我们能够胜利地突出敌人的重围和创建新的根据地，这是因为我们有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有一支党领导的坚强的部队和支持我们的人民，有兄弟部队的支援和配合，还有各地党组织尤其是陕南、关中党组织的接应和配合。 ”记得 1946 年 10 月 3 日，我在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发表《人民军队是不可战胜的》广播词时，也曾说过“ 这次我军突围胜利，基本的原因是我军全体将士，都认清了蒋介石背信弃义卖国殃民的罪恶，认清了美国帝国主义武装干涉中国内政，而激起了我军高度的爱国主义与革命英雄主义的精神。 ”继中原突围之后的各路部队的转战，乃至全国解放战争赢得最后胜利的历史事实，都进一步证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同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具有高度爱国主义与革命英雄主义的人民军队，永远是不可战胜的。

这里还应特别提到，当年中原军区部队在中原突围前后所取得的胜利，是与李先念司令员所起的作用和作出的卓越贡献分不开的。先念同志是一位在长期革命战争中锻炼成长起来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他出生于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少年时为生

活所迫，离家到汉口学木工。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使他受到很大影响。他毅然于1926年10月回到家乡，参加和领导农民运动，翌年11月率领本乡农民自卫军参加了著名的黄麻起义，同年12月，在白色恐怖下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先后任中共高桥区委书记、区苏维埃政府主席、（黄）陂（黄）安南县委书记。1931年10月，他率领陂安南县的一批青年加入红军，并任红四军第十一师第三十三团政治委员。他善于从战争中学习战争，从实践中积累政治工作经验，在粉碎敌人对鄂豫皖根据地的各次“围剿”中，他率部出色地完成了各项战斗任务，显露了军事才华，并于1932年接任红四方面军第十一师政治委员。在西征转战中，他率部顽强奋战，多次承担重任，化解危局，为实现红四方面军的战略转移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创建和发展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他率部参加了许多重要战役、战斗，战绩辉煌。1933年7月，红四方面军扩编时任第三十军政治委员。1934年1月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长征中，先念同志奉命率部迎接中共中央及红一方面军，实现懋功会师，并指挥包座战斗，打开了红军北上通道。红一、二、四方面军在会宁会师后，红四方面军一部奉中央军委命令西渡黄河，执行新的战略任务，先念同志率部在西渡黄河、血战河西走廊的斗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1936年11月，成立西路军军政委员会时被任命为军政委员会委员。西路军受挫后，1937年3月成立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由先念同志统一指挥军事。他以对革命矢志不移、百折不回的顽强奋斗精神，率领西路军余部西越祁连山，穿过戈壁滩，历尽艰辛，于1937年4月底到达星星峡。他在西路军建树的功绩和表现出的坚强党性，毛泽东主席曾给予高度评价：李先念是将军不下马的。徐向前元帅也说：“先念同志受命于危难之时，处险不惊，为党保存了一批战斗骨干，这是很了不起的。”他就是这样从一个普通木工，在早期革命战争中成长为英勇善战、屡建奇功的高级将领。

在抗日战争时期，正当武汉沦陷、抗战进入相持阶段的紧要关头，先念同志受中共中央和中原局委派，又从延安奔赴中原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1939年初，他率领一支由160余人组成的新四军独立游击大队，自河南确山县竹沟镇南下，向武汉外围敌后挺进。在极端复杂困难的情况下，他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六届六中全会精神，正确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同其他领导人一起，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在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武汉外围敌后地区，创建了由他任师长兼政治委员的新四军第五师和鄂豫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开创了一个孤悬敌后的独立作战区域，1942年7月，开始由中央军委直接指挥。1943年1月，他就任鄂豫边区党委书记，仍兼五师师长和政治委员，经过7年奋战，他率领的五师部队发展成为5万雄师，先后歼灭日伪军43万余人，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多次反共高潮和反共摩擦，解放了鄂豫皖湘赣5省边区的9万多平方公里土地和1300多万人口，建立了7个专区和38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从战略上配合了兄弟部队在华北、华东解放区战场的作战，同时也支援了国民党抗日部队在中原正面战场的作战，在中华民族抗战史上写下了光辉篇章。在这一时期，先念同志已经成为比较成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了。在1945年6月举行的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先念同志当选为中央委员。

抗日战争结束后，先念同志若率部向东进入华东解放区，或向北到晋冀豫鲁解放区，那都是较顺利的事，但他从我党我军对付蒋介石发动新的内战全局出发，冒着巨大的危险，忠实地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先后

率领新四军第五师和中原军区部队，在作为全国 6 大作战区域之一的中原解放区，顽强进行战略坚持达 10 个多月之久，为全党全军实现战略转变赢得宝贵时间，发挥了重要作用，1946 年 6 月，当国民党以 30 余万大军将中原我军重重围困，妄图“一举包围歼灭”，制造第二个“皖南事变”时，先念同志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以无产阶级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从容自如，指挥若定，与中原局、中原军区其他领导同志一起，作出了主力以南北两路向西，其他在东西北线行动的分路突围、相互策应的具体部署，并选定敌人“7·1”发动总攻之前，于 26 日夜指挥中原我军出敌不意，一举突破国民党军的内层包围圈，展开了震惊中外的中原突围战役。他亲率中原局、中原军区首脑机关所在的北路主力，斩关夺隘，冲破了数倍于我的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长驱 1000 公里，胜利实现战略转移。与此同时，他还指挥了其他各路部队的突围行动。突围战役后，他又坚决按照党中央、毛主席的新决策，积极部署和指挥创立了豫鄂陕、鄂西北两个敌后革命根据地，坚持和发展中原敌后游击战争，并且是豫鄂陕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党中央决定中原局设在延安后，他和中原局其他领导同志一起，继续指挥了中原军区仍在外线作战的各路部队和豫鄂陕、鄂西北根据地的斗争。1947 年 8 月，先念同志作为新的中原局第二副书记、晋冀鲁豫野战军副司令员，继任重建的中原军区第二副司令员，亲率第十二纵队投入反攻中原。后与率部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刘伯承、邓小平等同志一起，参与指挥了重建大别山革命根据地的工作，实现了党中央、毛主席关于战略反攻的伟大构想。先念同志在中原突围前后所起的重要作用和作出的卓越贡献，充分地显示了他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的全局在胸、无私无畏的崇高精神，临危不乱、运筹帷幄的雄韬伟略，娴熟高超、运用自如的指挥艺术。

我国社会主义事业正处于关键时期，全体共产党人和全国人民肩负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认真学习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历史，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对于进一步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全面地、准确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更好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推进改革开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相信，全国各族人民一定会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挺起胸膛，艰苦奋斗，把邓小平同志倡导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为最终实现宏伟、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而不懈奋斗！

要正确评价中原突围 (代序之一)

李先念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进入了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决战时期。蒋介石依仗美帝国主义的支持，经过长期的准备，扬言要在3个月至6个月的时间内消灭全部人民解放军。我们党由于采取了正确方针，自己的力量发展很快，到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前夕，人民解放军已有120多万人，除了党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解放区以外，形成了6个大的作战区域，即晋冀鲁豫、华东、东北、晋察冀、晋绥、中原6大解放区。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以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发动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因此，中原突围是中国革命战争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也是党中央、毛主席的重大战略部署。如果有人认为中原突围就意味着失败，那是因为不了解历史情况。

中原解放军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由原新四军第五师和王震、王首道等同志率领的八路军第三五九旅南下支队，王树声、戴季英等同志率领的河南（嵩岳）军区部队，王定烈等同志率领的冀鲁豫军区第八团组成的。1944年11月，王震、王首道等同志遵照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率领三五九旅南下支队从延安出发渡过黄河，于1945年1月到达鄂豫边同五师会师。随后，又跨长江到湘鄂赣和湘粤赣边去开辟抗日根据地，以求达到北和鄂豫边区的五师、南和广东曾生同志领导的东江抗日纵队连成一线的战略目标。他们不畏艰难险阻，不怕流血牺牲，以无比惊人的毅力和英勇顽强的革命精神，南征北战，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日本投降后，由于时局和中央部署的变化，他们又北返，和我们在中原重逢。王树声、戴季英等同志率领的部队，也是经过艰苦奋战才从嵩岳地区到达桐柏山区的。三支主力部队会合后，正式组成中原军区。这几支兄弟部队互相学习，互相支援，团结一致，并肩战斗。

在1945年8月至1946年6月的10个月时间内，中原我军五六万英雄儿女，把国民党30余万军队牵制在中原地区，这就有力地支援了华东、华北和东北地区的兄弟部队，为做好迎击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准备，赢得了宝贵时间。如果不是为了牵制敌人，当我们结束了桐柏战役后，部队一直向东走，最多5天就可以到达苏皖解放区。那时跟在我们后面的国民党部队只有一个军，打过去毫无问题。后来突围，是按照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指示行动的，是有准备有计划战略牵制和转移。1945年9月，毛泽东同志在重庆同国民党谈判时，准备让出的8个解放区，就有湖北和河南。随后，我们让王震同志回延安向党中央汇报情况，请示行动方针。毛泽东同志作了重要指示。他说，国民党反动派对待我们的原则是，“能消灭的则坚决消灭之，现在不能消灭的则准备条件将来消灭之”，我们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还估计到中原解放军是要吃苦的，要准备作出重大的牺牲，但最后胜利一定是我们的。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非常及时，非常正确，使我们在错综复

李先念同志在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期间的1982年、1983年，曾三次同武汉军区和湖北省从事编写革命史工作的同志谈话。《要正确评价中原突围》，是这三次谈话的整理稿《关于编写新四军五师战史和鄂豫边区革命史的谈话》中的第十个问题，即最后部分。节录自人民出版社1989年1月出版的《李先念文选》第449至454页。

杂的情况下，保持了清醒的头脑。1946年突围前夕，毛泽东同志在6月23日的电报中说：“同意立即突围，愈快愈好，不要有任何顾虑，生存第一，胜利第一。”我们突围后，毛泽东同志又在7月15日以中央军委的名义给我们打电报，对这次突围作了正确评价。他说：“整个突围战役是胜利的，敌人毫无所得。你们这一行动已调动程潜刘峙胡宗南三部力量，给反动派以极大震动与困难，故你们的行动关系全局甚大。”10月，毛泽东同志在《三个月总结》中又说：“过去三个月内，我中原解放军以无比毅力克服艰难困苦，除一部已转入老解放区外，主力在陕南、鄂西两区，创造了两个游击根据地。此外，在鄂东和鄂中均有部队坚持游击战争。这些都极大地援助了和正在继续援助着老解放区的作战，并将对今后长期战争起更大的作用。”以中原突围为起点，截至1947年2月，中原解放军又在敌后转战了8个月，继续牵制了国民党24个以上的正规师和大量保安团队，既为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延安作出了贡献，又紧密配合了华北、华东各兄弟部队的胜利作战。

我们能够胜利地突出敌人的重围和创建新的根据地，这是因为我们有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有一支党领导的坚强的部队和支持我们的人民，有兄弟部队的支持和配合，还有各地党组织尤其是陕南、关中党组织的接应和配合。在中原突围战役和创建新根据地中，广大指战员为了解放战争全局的胜利，英勇奋战，作出了重大牺牲。在国民党几十万部队重重包围的极其险恶的情况下，还能保留下来两万余人，这是很不容易的。张才千、李人林同志率领千余人，冲破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越汉水，跨长江，进到湘鄂西部地区，王定烈同志也同他们一起转战大江南北。皮定均同志率领几千人向东突围后，胜利地进入了苏皖解放区。张体学、何耀榜、刘名榜、熊作芳等同志率部在大别山地区，罗厚福等同志率部在鄂西北地区，刘昌毅等同志率部从鄂西北到皖西地区，文建武、汪锋等同志率部在豫鄂陕地区，还有一些同志率领小股部队分散在中原地区，他们都以坚强的革命意志，在极其艰苦和极其复杂的情况下，坚持和开展了游击战争。这些保留下来的经过千锤百炼的党的干部和武装力量，后来又在反攻中原、解放全中国的战斗中立下了新的功绩。

当然，严格检查起来，在准备和实行突围的过程中，也有缺点和错误，这主要责任在我。首先，在突围前对全国迅速发展的形势认识不够，估计不足。中原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我们是在国民党统治的心脏地带，他们决不会甘心让我们呆在这里的。对国民党假和谈、真备战的阴谋，我们是有认识的，对他们要打内战是有思想准备的，尤其是王震同志从延安回来传达毛主席指示以后，思想上更明确了。其他解放区可能会有一段和平时期，而中原解放区则不可能，必须立足于打。但是，当国民党的30余万军队，把我们包围在方圆仅两百里的宣化店地区的时候，个别负责同志曾散布失败情绪，说什么“内无粮草，外无救兵，打也打不赢，走也走不了”。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在领导干部中加强对形势的研究和分析，正确估计敌我双方力量对比，统一思想，克服错误思想情绪，坚定胜利的信心，并动员军民充分做好打准备，但当时这一点做得很不够。其次，在突围前，对地方党组织、政权、群众工作怎样积极转入地下，缺乏周密准备，抓得也不得力，尤其是对坚持敌后游击战争的重要性和可能性认识不足，部署也不周到。因此，根据地受到的损失比较大。这些经验教训都应该总结。

对中原突围，如果由于不了解当时的历史情况，有些误解，可以原谅。